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第一辑

现代史学意识与 传统教育研究

徐梓◎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第一辑

现代史学意识与 传统教育研究

徐
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 / 徐梓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517 - 6

I. ①现… II. ①徐…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5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总 序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高等学校，一百多年来，先后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史学者，形成了丰富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全国的教育史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就在全中国率先创建了教育史教学组。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邱椿教授、毛礼锐教授、邵鹤亭教授、陈景磐教授、瞿菊农教授等一批教育史学者齐集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全国一流的教育史学术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殚精竭虑，著书立说，培养后学，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教育史专家。

近三十年来，以王天一教授、张鸣岐教授、夏之莲教授、吴式颖教授、朱美玉教授、高奇教授、王炳照教授、刘德华教授、郭齐家教授、何晓夏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代教育史学者继往开来，锐意进取，重建和振兴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通过队伍建

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继续保持了自我发展和不断更新的良好态势。2001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主要以原教育系一个教研室的力量为基础申请国家重点学科并获得批准。2007年被再度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20世纪末以来，老一辈教育史学者相继离开工作岗位，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如何在老一辈教育史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事业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和知识进步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教育史学科发展，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继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如何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科积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更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如何通过学术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推进教育史课程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功用？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教育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作为解答上述课题的努力，经过反复论证，我们确定以“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今后若干年内的主要研究领域。之所以确定这一研究领域的原因是，首先，有助于开辟教育史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自有人类以来，教育始终是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紧密相关的。教育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相互关系的视角开展教育史研究，有助于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扩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探寻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丰富教育史研究。

其次，有助于拓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将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通过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不同时期和教育的影响，研究教育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有利于消除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之间的界限。

第三，有助于发挥学科优势，产出重大成果。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历来注重历史文化的积淀，注重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发挥学科传统优势，加强团队合作，协同开展攻关，实现学科建设的目标，产生重大的研究成果。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是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三期“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与中国教育创新基地”的建设项目之一。本丛书是这个项目建设的主要成果。我们计划在今后几年中，分辑陆续出版，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团队的工作成果，以就教于教育史学界同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以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学者的优秀成果享誉学林。“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的出版，得到该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2年8月

目 录

第一编 史学理论

史学与现实	(3)
伟大历史学家的特征	(17)
当代史研究的困厄和优势	(34)
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	(45)
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	(58)
我国历史哲学研究中亟待克服的偏向	(66)

第二编 西方史学

非“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79)
把历史研究引向长远和深广 ——读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	(88)

弗洛伊德与现代文明	(103)
-----------------	-------

第三编 中国史学

为了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	(123)
陈垣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132)
陈寅恪史学的民族文化特征	(159)
张舜徽先生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175)
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教育意蕴	(192)

第四编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与士人心态	(219)
科举制度对公平的追求及其对自身的戕害	(227)
传统学校教育 with 人才选拔的关系	(244)

第五编 古代书院

书院祭祀的意义	(261)
宋朝遗民与元初书院传统的弘扬	(269)
朱学与元代书院	(289)

第六编 孔子与教师

遍布全国的孔庙	(299)
教师称谓的历史演变	(308)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历史诠释	(323)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337)
后记	(362)

第一编

史学理论

史学与现实^{*}

—

历史学以人类社会的过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这种研究在许多人那里表现为埋首书斋而不闻窗外事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人们的一种错觉，似乎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是毫无关系的。即便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实生活所在的现在，在时间上是相互连续的缘故。史学与现实的扞格不通，从本质上说，是对历史研究中主观和客观所作的绝对区分所致。因为只有根除了现实的思想和精神的作用，才能有冷酷的、超然的客观。也只有在杜绝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之后，研究者才可以完全陶醉在历史学方法的改善、考古学知识的进步以及原始资料的偶然发现和巧妙诠释里头，通过辛勤的研究和谨慎的连缀，不失其真地描绘客观存在的过去。在这里，客观存在不是最广义理解的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内的存在，也不是现实的存在，并且排除了以过去为中介表现出来的现实性，它是指既成的、不变的、“死”

* 本文约写作于1988年，这里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了的过去才具有的那种特征。

这样，把历史看做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事实的堆积，视历史研究与现实是全然无关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孜孜矻矻于史料竭泽而渔的搜集，再怀负对真理的尊崇和热爱的态度，对其进行不掺主观好恶的确定或核实，并根据它来编织历史的进程，最后客观地叙述出来，形成著作。一句话，超脱于现实之外，客观地再现过去历史的真实，这是迄至 19 世纪西方历史学家的普遍认识，而今也为我国的许多史学工作者所津津乐道，并在实际研究中所遵从。

在被嘲笑为做着上述“那个崇高的梦”的史学家中，首先被论列的每每是兰克及其学派。在我看来，对于兰克没有契进其整个思想的指斥，委实有太多的失其旨趣之处。但是，他宁愿抹掉自己的个性来“只打算完全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相”，希图依靠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如实直书”去再现过去历史的真实，这种愿望中也确乎隐藏着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态度，尽管这是一种历史学家可贵的严肃认真。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经极具见地地指出，兰克这句并不十分深刻的格言之所以获得惊人的成功，那是因为他所在的 19 世纪是一个只需要事实并且只尊重事实的时代。对那时盛行的实证论者，加列提挖苦地说：实证论者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糟糕的是思想贫乏和迂腐习气，他们“不去激发智力……而是经常不断地叫嚷——事实啊！事实啊”。所以，孤囿事实，正是沉缅于过去，并偏执于此的必然表现。

这种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割断的偏向，在关于史学意义的一种意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这一意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由于认定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无关，从而也就否认了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可能性，只是强调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独特性。既然它们都是十足独

特的，它们便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有益于今的结论。在其因为特殊而失去在今天意义的前提下，执迷于对这种特殊意义的探寻。基于把认识的目的归结在认识对象上的荒诞，历史学被幽禁在修道院式的博学的禅房中，找寻过去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时，史学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研究对象的去今甚远而被误解，韧性的努力，不再是由于对现实的需要所抱的殷切希望所鼓舞，而仅仅是出于依恋追怀过去的积习和凭吊欣赏往古的天性所致。

二

即使最保守的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也都承认：历史研究并不能超然于现实生活之外，历史学不应该成为无助于我们当下工作和事业的无用之物。

作为审查对象的首先是历史事实，它们是否是真正“硬邦邦”、“冷冰冰”的纯粹客观呢？卡尔·贝克用近似于早年教育中所学的如何去求最小函数的方法引领我们思考：的确，在过去的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诸如“林肯被刺”的实实在在的事件。但是对于这些事件，我们仅仅不大肯定地知道其中的那么一点点。对于远逝的过去，我们所能依据的唯一客观的真实，乃是事件通常以文献和其他形式遗留下来的物质痕迹。所以，“事件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①历史的本质因此被论定

^①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

为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①。无论是潜藏在文献抑或是包容在记忆中的历史事实，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任何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过是前人或我们自己当时主观或偶然工作的残留。假如时间能够倒流，我们或许会作完全不同的选择；又假如这种残留更全面一些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人们所顶礼膜拜的史料不是别的，不外乎是产生这些史料的那个时代思想和精神的产物罢了。并且，它们之所以侥幸逃脱佚失的命运而流传至今，同样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汰选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一些人所希冀的可靠的实在，而是过去的遗存，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客观的形式下面存在着主观的内容，平静的客观河流之下，潜藏着汹涌的主观的暗流。

经常有人说，史学所要做的，就是呈现所有的事实，并且让事实自己讲话。比如，法国史学家福斯太·德库朗惹就是如此。“一天，他正在给他的学生讲早期法国的制度，这些学生突然鼓起掌来。福斯太说：先生们，不要鼓掌，这不是我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的。”^②对于这种机智的谦逊，爱德华·霍列特·卡尔驳诘说：“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有人说，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③堆积如山的散乱史料和其中的零碎事

①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②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③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实，它们的登台讲话，既不是杂乱无序，也不是民主轮流，而是严格地选择。他们是否为历史学家所注意，是否为研究者所利用，以怎样一副面貌出现，要被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都是选择的结果。这里说到选择，也就意味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受着某种特定观点的影响，并根据它确定取舍标准。我们对于过去提出的问题，既不同于前人，也有别于来者。我们现在所着重考虑的东西，或许是我们祖先从前所忽略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所忽略的东西，或许是我们未来的子孙认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选择标准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标准，又是根据同一标准确定的，这就是现实。帕森斯把科学叫做以现实为明确方向、经过选择的体系，这于历史学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尤其如此。各个时代只能根据它们各自面临的问题审视历史，这样，一度活跃过的事实终于再度沦落到无意识的深渊，归于沉寂，而另一些颇有意义的事实，则被从先前认为似乎无用的资料中被挑选出来。

如果说每一种选择都构成一种判断的话，那么选择之后的组织安排，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或者漠视、或者强调、或者漫不经心的略为提及、或者深具热情的具体入微，就更是一种判断了。历史好似一张纵横交错的普遍联系的大网，历史事实好似这张网上的一个个纽结。过去的事实如果不被记省，不被选择，固然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如果不被镶嵌在整体的历史图景中，“除非把它放进孕育它的复杂的环境网中，否则它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① 不仅每件事实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受着无数其他事实的牵制，联系是那样的普遍和密切，以至于事件并不是以它本身，而是作为另外一些事件的象征，作为一连串事件的代表而存在的；而且，每一个事实都具有非陈述所能完全显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

示的复杂结构，任何“简单的事实，最后看来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许许多多事实的一个简单概括罢了。”^①因此，在由许多具有繁富要素的事件构成的整体中，牵一发而全身动，哪怕是对任何事件构成要素的强调或漠视，都意味着对全幅历史图景安排的变化。不言而喻，这种强调或漠视，不是由于事件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研究者的缘故。而研究者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人类生存的条件使得他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而不属于他的研究对象即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简而言之，历史学家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是通过现在这双眼睛审视过去，透过现实精神这扇窗口理解历史的。

我们并不崇尚事实是可有可无、解释就是一切的极端说法，但是相信解释是历史生命所必须的血液。任何历史学家如果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我们知道，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大体上是无法依从一种客观标准的。任何所谓的客观标准，都必然是特定的主观的普遍的推广。因此，任何解释也并不是最终的、一定不移的定论。不仅我们大家的解释不相同，而且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时常变化着。每一个时代尤其是从内部到外部都发生过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解释会相去甚远。这并不是试图把从我们所在的时代中获得的不适当的解释强加于过去的时代，而是因为“任何历史学家都免不了要利用——事实上也不应该拒绝利用——他那时代提供的最好的灯，因为他是写过去而不是为过去而写，他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公众而

①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